



# 古典与浪漫

## 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李 著



# 古典与浪漫

## 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黄红春 著

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13XCZ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与浪漫 : 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 黄红春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10-07411-3

I. ①古… II. ①黃… III. ①新月派—文学流派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4301 号

## 古典与浪漫 : 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黄红春 著

责任编辑: 王醴頤 王彦山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 330006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01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983

网址: [www.jxpph.com](http://www.jxpph.com)

E-mail: [superpoem@126.com](mailto:superpoem@126.com)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336 千字

ISBN 978-7-210-07411-3

赣版权登字—01—2015—4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39.8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序 言	颜 敏	1
绪 论		7
一、新月派研究的意义		8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11
三、五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17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20
第一章 新月派生成的历史语境		24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的思想启蒙		25
第二节 近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		32
第三节 新人文主义传入中国		40
第四节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48
第二章 新月派文学观念的发展脉络		56
第一节 清华学子追求自由独立、民族国家的文艺		58
第二节 新月社主张接续古今、融合中西的文艺		64

第三节 《新月》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文艺	74
第四节 《诗刊》《学文》淡化功利,回归艺术本体	80
<b>第三章 新月派基本文学观</b>	86
第一节 重视人性和理性的古典观	86
第二节 强调天才与灵性的浪漫观	96
第三节 从浪漫的美到古典的美	99
第四节 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人生艺术观	106
<b>第四章 新月诗歌:规范与自由的消长</b>	113
第一节 中西诗艺融合观	114
第二节 新格律诗理论	133
第三节 疏离规范的审美超越	149
<b>第五章 新月散文:“性灵”追求与“自由”言说</b>	162
第一节 信仰生命与自然	163
第二节 任意而谈与笔战鲁迅	175
第三节 呼吁人权与法治的“论政风”	184
<b>第六章 新月戏剧与小说:对古典主义的守执与超越</b>	196
第一节 国剧运动对新民族戏剧的构想	197
第二节 剧本创作中的多元美学思想	213
第三节 守望古朴与纯真的新月小说	226
<b>第七章 唯美与实用并举的新月翻译</b>	245
第一节 翻译诗学视域下的理论与批评	246
第二节 新月派翻译实践中的文学观	258
第三节 新月派翻译与异质文化的互动	272

结 论	286
一、重估新月派及其影响下的自由主义文学	286
二、对新月派现代性和人文精神的反思	289
三、文化认同与“民族的”、“世界的”文学观	291
参考文献	295
新月派研究资料索引	304
后 记	318

目录



# 序言

颜  
敏

序言

黄红春的这部学术专著,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见证了这部专著的成形过程,也见证了一位年轻学人对于学术的执着,及其隐含的这个年代弥足珍贵的职业伦理精神。

新月社是现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但是,与新月社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相比较,关于它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很不成比例的。究其缘由,学界一般认为,这主要是新月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针锋相对;二十年代末新月派与左翼文学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明证。1949年后,当年左翼文学的践行者完全掌握了文学话语权力,并按“意图伦理”的原则编撰现代文学史<sup>①</sup>;根据新月社主要成员惧怕革命的政治态度,将其认定为“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因此新月派的文学史价值地位被忽略,甚至遭受排斥。新时期后,新月派开始进入学界视野,但是大多只是关注它的文学实绩,自由主义文学的思想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理解与深度开掘,为什么?

其实,关于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多舛命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sup>①</sup>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117页。

上述的说法只是涉及新月社被现代文学史冷遇的近因。自由主义文学原本是从新文学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派别,因而远因还要追溯到五四时代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最初,以陈独秀、胡适和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竖立起新文学这面大旗,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新文学团体内部便出现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裂痕,而且他们的分歧由社会政治观念扩展到文学思想观念,最终导致新文化团体的分化。可以说,他们是在这面大旗下聚集,又在这杆大旗下分道扬镳的。时值今日,新文化团体当初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设想及其分歧,依然引发我们深省。

后来成为新月派精神导师的胡适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sup>①</sup>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则回应道:“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sup>②</sup>在我看来,这是晚清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争,在新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下的继续、深化与变异;二十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形成的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双峰对峙的格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代中国这辆庞大的社会列车步上革命的轨道,既有外部历史现实的驱动力,也有内部思想文化的惯性,它一旦隆隆开启,气势如虹。直至我们置身其中的新世纪之交,还能听到对于“告别革命”的辩难声音。难道这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宿命般的两难选择?

尽管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业已作出严酷的结论,自由主义的改良思想生不逢时;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个历史结论只是社会政治的结论,而思想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缘由,远比政治历史更为复杂和微妙。其实,曾在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与鲁迅为代表的语丝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就有过种种龃龉,虽然个中恩怨有着不同的原因与媒触,但是经由时间潮水的冲刷,个人

<sup>①</sup>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

<sup>②</sup>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情绪与是非曲直大多淡化,最终缘由还是隐隐约约指向新月派的“绅士”文化品位和精神气质。例如鲁迅屡次嘲讽徐志摩,曾令徐志摩感到十分惶惑,为此专门致信周作人,想了解鲁迅为何如此。鲁迅后来解释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sup>①</sup>这就是说,鲁迅与徐志摩的是非恩怨,如果祛除具体的矛盾媒触,那么主要缘由还是在于他们现实人生态度和个性的差异,在于他们不同的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

新月派成员大多留学欧美,他们的价值观念既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又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开阔而不芜杂、灵动而不游荡的文化心理,养成理性、节制、儒雅、宽容的精神气质。同时,他们大多身居以高校或者文化机构为主的象牙之塔,物质生活优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竞争社会的“成功人士”。可能连这些倡导启蒙理性的文化精英自己都不明白,不仅他们自由理性的微弱声音,极易被激进革命的喧嚣所掩盖,而且就是他们的超越性精神、优裕的生活,以及节制宽容的人生态度本身,在那个急剧世俗化与平等化的过渡性现代社会,也会成为社会怨恨情绪的关注焦点。诚如舍勒所说,在一个由封建等级化向现代平等化过渡的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sup>②</sup> 新月派这些向往自由理性的绅士,在动荡的现代中国,犹如汪洋大海中的礁石,轻而易举地被革命的狂风暴雨淹没。不过,以往人们只是关注表层社会的革命合理性,却忽视隐匿其下的暗涛汹涌的幽暗人性。

研究法国革命的权威勒庞认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后果差异在于,宗教革命没有任何经验可向其教徒揭示他们是否受到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sup>③</sup> 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再次领悟到人类关于复杂社会的认知有限性,这种认知的有限性使人类社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纠错能力;因此成熟的现代社会都会承认文化的多元化,认同精英文化的存

<sup>①</sup>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sup>②</sup> [德]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页。

<sup>③</sup> [法]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在价值。正是从这种角度讲,如果我们拂去蒙在新月派上的历史尘垢,那么理应重视以新月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的思想价值,并将它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可得性知识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随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延展和深入,我相信自由主义文学的思想文化资源,会越来越显现它的价值意义。

黄红春的这部专著,主要梳理和论述新月派的文艺思想。我认为,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这部专著以文体为架构,结合新月派成员的创作实绩,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这个自由主义文学社团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倾向。它认为,新月派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兼具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具体地说,新月派的文艺思想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在艺术与人生关系的价值取向上,提倡自由和理性;在审美倾向上则主张古典与浪漫。

新月派成员中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卓有建树的,当属梁实秋,因而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新月派文艺思想的主要代言人和阐释者。由于梁实秋师承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白璧德,因而他的文艺观念并不前沿;与当时动辄标榜“主义”的先锋理论家相比,他更喜欢讨论人类先哲念念不忘的“人性”,主张以人文价值来规范人生,倡导文学表现普遍与永恒的人性。这种文艺观念,一方面以人文主义思想为纽带,连接中西文化观念,使现代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道德焦虑推动着人类的人性思考。这种人性思考的社会意义,恰如维柯所说:“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使专心致志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sup>①</sup>

新月派不仅在文艺思想方面强调人文精神,社会观念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新月派在三十年代初期发起了自由与人权问题的讨论。当时迷信意识形态的人也曾讥讽他们,认为那是过时的思想观念。梁实秋直至晚年还提及这桩思想公案:“当时也有人(因谈自由与人权)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 18 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个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

<sup>①</sup> 转引冯克利:《小观念里的大见识》,《读书》,2015 年第 2 期。

声呐喊之外还有什么感想?”<sup>①</sup>尽管新月派关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存在历史判断的偏见,但是他们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论述,关涉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架构,而且是革命意识形态无法替代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

其次,这部专著清晰地梳理出新月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通过新月社主要成员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研究,论述了这个文学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虽然新月社本身存在的时间不过十余年,但它在新文学历史中上承“现代评论派”,下启“京派”,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如果再拉开文学历史审视的镜头,新月社开创的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历经磨难薪火相传,业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月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都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但是沈从文却是个例外,为此能否把沈从文列入新月社,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部专著认为,应该把沈从文看作新月成员,并且援用详尽的资料加以说明。表面上看,将沈从文视为新月派成员,可以壮大新月社的文学实绩,因为新月派的创作业绩主要表现在诗歌、戏剧和散文领域,唯独小说,只有沈从文及凌叔华具有文学史价值。但是,倘若我们从新月派的文艺思想角度阐释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则可发现沈从文小说的深层意义。他在“湘西世界”中悉心构筑的“人性神庙”,旨在唤醒我们民间社会自在形态的自然、质朴和健康的人性,深刻反思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导致的功利主义,以抵御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和自然世界病态的肆意挥霍。这是现代语境下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人性思考,而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只是以牧歌式的宗法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徒然对抗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文化。

最后,这部专著既有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扎实的文献资料,还有比较敏锐的个人洞见。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专著紧贴研究对象,资料翔实,论据可靠。这不仅充分体现出作者在资料爬梳和整理方面所下的功夫,而且关乎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是现代学术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坦率地说,现在许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为了深刻阐释研究对象,迎合所谓的“创新”意义,苦心孤诣地援引理论,而且对国外前沿性理论趋之若鹜。善于

<sup>①</sup> 转引宋益乔:《新月才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学习新理论和新方法,这原本是个好事,但是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是先寻求一种思想观念,制作一个理论框架,再根据这个理论结构来分解研究对象,然后进行论证与分别阐释。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在有的国外文学理论与其研究的本土对象不甚契合的情境下,它们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削足适履。这种理论先行的结果,导致研究对象被肢解甚至被扭曲,以致面目全非。我赞同的文学研究路径是,首先应从研究对象本身着手,在原始资料与既有研究成果中发现问题,再援引相关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在论据可靠与论证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刻阐释。

我在翻阅新月派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当代学人有意无意地放大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纯真心态和自由精神,而忽略他们心路历程的苦痛和日常生活的无奈。也许,这种“误读”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某种人格依附、内心压抑和精神焦虑的心理补偿?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些学人在研究对象中不由自主地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他们在研究对象的同时,无意之中也在反视自身,因而从交互的思想情感中体悟到一种人文研究的精神甘苦。是的,这个年代的治学者甘苦自知。故此,祝愿黄红春今后的学术生涯,理解对象,慰藉心灵,不断提升自己学术研究的境界。

# 绪论

绪论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新月人物，始于徐志摩之浪漫而终于梁实秋之古典，清辉不减，已经近于满月了。”<sup>①</sup>虽然此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真正最后一位新月人物是诗人兼翻译家孙大雨，比梁实秋晚十年去世，却也暗示了新月派集浪漫与古典于一体的特征。

新月派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由于新月派的诗歌成就最为显著，不仅有丰硕的诗歌创作实绩，而且有影响深远的新诗格律化理论，所以，学界有人将新月派称为“新月诗派”。但实际上，除了诗歌，新月派在戏剧、散文、小说和翻译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因此，我们这里的“新月派”是指属概念上的综合性文学流派，而非种概念上的诗歌流派。

不幸的是，新月派曾被文学史误读与遮蔽，它被贴上“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等标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文学回归艺术本位，新月派重新受到关注。

笔者之所以选择新月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思考：

<sup>①</sup> 余光中：《金灿灿的秋收》，余光中编《秋之颂》，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 一、新月派研究的意义

首先,新月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分化的产物。在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的情况下,五四知识界对于中国未来之路有着不同的声音。1919年,《每周评论》围绕“问题与主义”展开论争<sup>①</sup>,其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声音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应该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一个信奉自由主义,主张学习英美走民主宪政和渐进改良的道路。二十年代中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革命与改良两种思想最终分道扬镳。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改良的道路,继续坚持文化启蒙思想,在文学上以人性为基点,以自由为核心,执意为新文学建立一种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体系。所以说,新月派是在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尽管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唯一的,革命思想与左翼文学一时成为主流,但是改良的政治主张和自由主义文学并非毫无价值,它仍然以辅助性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参与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并对主流思潮进行反思和纠偏。新月派固然被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批评过,但它反拨政治对艺术的异化、促进新文学审美多元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左翼文学和新月派文学产生矛盾的根源,是左翼作家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让文学担负起政治宣传的重任,并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新月派知识分子却反对暴力革命,希望通过改革社会和改良人性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政治,让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相当的体现。这两派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却是相通的,都反对专制政治,都认定艺术和人生有关,希望文学能匡时济世。所以说,自由主义文学和其他文学思潮一样,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正如秦弓所说:“历史本身总是比任何一种论断都要复杂。自由主义文学虽然曾经被左翼视为当局的帮闲甚或帮凶,但实际上从整体看来,自由主义文学始终坚持批判专制的立场,可以说是左翼的同路人。”<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

<sup>②</sup> 秦弓:《鲁迅对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2期。

不可否认,自由主义思想自有其内在的局限,但如果今天我们承认五四民主自由思想是可以继承的传统之一,那就应该正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从而也应正视新月派的存在。

其次,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在学界关于新月派的研究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的视之为浪漫主义,如任岩岩认为,受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前期新月派“也和创造社一样显示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为新诗从外在形式探索到对诗本体艺术的追求做出了重要贡献”<sup>①</sup>;有的却视之为古典主义,如白春超认为“反叛浪漫的古典主义才是新月派的标志,是新月派之所以成文学之‘派’的凝聚点和黏合剂”<sup>②</sup>;也有的视之为多元的综合体,如程国君认为新月派包含了多种审美要求的融合,在从《诗镌》到《新月》的鼎盛期,新月诗派总体倾向古典主义。但从《诗刊》后,“现代主义色彩逐渐浓烈,这就更难确定它的归属”<sup>③</sup>。到底如何定论,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爬梳史料,然后做出合理的判断。

新月派的核心成员是一批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希望建立具有日常性、普遍性、永久性的为人性的文学。他们的 人性观来源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对人的关注,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对理性的重视,以及对中国老庄哲学主张道法自然、消解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梁实秋说过:“我以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攻打‘孔家店’,不是反对骈四俪六,而是严正地批判老庄思想。”<sup>④</sup>新月派一方面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希望新文学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另一方面积极借鉴和汲取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以促成新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可见,新月派文学是现代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对时代、社会和人生思考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学艺术的结晶。

再次,新月派的艺术态度于当下文学发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自由和理

<sup>①</sup> 任岩岩:《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前期新月派影响分析》,《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sup>②</sup> 白春超:《理性与秩序: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

<sup>③</sup> 程国君:《浪漫诗人的古典寻求——新月派审美观念的主要形态及其古典寻求的诗学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sup>④</sup>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偏见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152页。

性是新月派对于文学的两种基本态度。自由不仅指人身体的解放,更强调思想独立和情感的无拘束。徐志摩说:“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sup>①</sup>而理性是指在处理文学情感和想象时,能把握“有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sup>②</sup>尺度。新月派时期,正值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之际,知识分子纵有救世情怀,也深感文学之于现实的无力。但是新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文学理想:他们强调艺术的本体性,着力于艺术美的创造;既重视文学为人生的价值,又反对夸大文学的作用。这种态度不失为当下如何面对文学边缘化的一面明镜,因为当下的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文化和尚不健全的文化体制对人文思想的挤压,文学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出现危机,缺乏包容和理性;二是电子媒体对传统文学造成很大的冲击。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指出,文学在电信时代,因为其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正在走向终结。<sup>③</sup>笔者认为,信息技术确实正在改变与影响文学生态和文学形态,但是,文学是否终结并不完全由媒体与技术来决定,因为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场域,文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文学主体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方式,母语文学创作和传播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等。所以,当下需要用新月派文人那种自由与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文学。

最后,新月派对于中外文化的态度,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可资镜鉴。乐黛云说过:“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的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打通思想,我打你通,让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统一,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sup>④</sup>新月派继承五四新文化兼容并包的思想传统,在新格律诗理论、国剧运动和文学翻译等领域,凸显了让中外文化平等对话的态度。而重构中外文化关系,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文学,必须具备世界性,以书写人类共同的人性为基础,才能被世界接纳;同时又不能迷失中国特性与民族个

<sup>①</sup> 徐志摩:《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赵遐秋等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sup>②</sup>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sup>③</sup>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sup>④</sup> 乐黛云:《中国文化如何面向世界》,《商周刊》,2012年第17期。

性,因为个性也是世界文学生生不息的基础和动力。研究新月派,不仅能为当下如何摆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提供启示,而且能为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经验。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关于新月派的研究成果大陆最多,台湾地区有少量,国外只有关于新月派成员的个案研究,流派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则尚未见。台湾的研究主要关注其诗歌领域的成就,如2003年张鸿恺的论文《浅谈新月派格律理论》,1988年台湾师范大学朴星柱的博士论文《新月派新诗研究》;也有少量对新月派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如1987年瞿光熙的论文《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1990年王宏志的论文《新月派综论》,其中有的欠深入和客观,如1980年陈敬之著《“新月”及其重要作家》,言辞偏激,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和主观性。

国内对新月派的研究始于新月派存续期,但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因为政治因素新月派遭到否定,从而导致除了研究其个别成员如闻一多外,其他几近空白。新时期以来,学界消除历史偏见,运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新月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新月派定位和组织活动的研究。1931年,“左联”成员彭康在《新思潮》2月28日第4期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联系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引起很大反响一事,指出新月派有政治性的特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运动是反动的。同年,汪常有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是共产主义,二是新月派,三是三民主义。因此,罗隆基给胡适写信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sup>①</sup>1935年至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朱自清在《诗集》的导言中比较分析了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并将当时的诗坛分为三派,其中之一就是意指新月诗派的“格律诗派”。另外,在他选编的59家诗人中,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作最多,可见新月派的新诗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不过,学界对新月派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1931年徐志摩意外身

<sup>①</sup> 罗隆基:《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